

咸丰大钱与通货膨胀

清政府采取的铸币贬值和滥发纸币政策，虽然搜刮到了铸钱利润，但是造成了此后的币制混乱和通货膨胀。大钱政策很快宣告失败，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长久的不良影响。

文 | 王红曼

纵观中国货币史，大面值钱币的发行总是在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国穷民弱的时期。比如，王莽铸钱是为了挽救西汉末年的财政亏绌；吴蜀铸钱是为了应付三国时战争的需要；唐肃宗铸乾元重宝和重轮大钱是藩镇变乱期间的财政措施；宋金铸钱是由于铜料缺乏，货币流通不畅，影响了国家财政；元末和明末也曾铸过大面值钱币，主要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挽救王朝濒于灭亡的命运。这些历史事实均说明，大钱制度是各朝代在非常时期推行的一种货币财政措施，也是掠夺人民财富的一种手段。

清朝的货币制度大体上承袭明制，是银两、制钱平行本位，除了顺治年间曾一度发行过宝钞（不久即停止）之外，直到咸丰初年基本没有变更。鸦片战争和战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兴起，巨额的对外战争赔款和内外战争支出使得清政府面临沉重的财政负担。鸦片战争后，外国机制银元大



量流入，中国白银大量流出，导致银贵钱贱。清政府财政越发困难，铜钱制度面临土崩瓦解的境地。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则几乎贯穿了咸丰王朝的始终，是促使清政府铸造大钱的直接原因。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了筹措军费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决意铸发减重不足值的大钱，也就是劣质铜铁货币。

当年3月，户部首先开铸当十钱一种，重6钱；8月，铸当五十钱一种，重1两8钱。铸造1枚当十大钱的用铜量只相当于此前10枚制钱的一半；而铸造当五十大钱的用铜量仅有原来的30%。同年11月14日，巡防大臣绵愉等又奏请推广，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同时提出，当千大钱以重二两为标准，当五百、当百大钱的重量依次递减。咸丰帝很快就表示同意，并指示户部让各省均照部议所定的分量，一体铸造，以归划一。此后，不仅户部、工部鼓铸大钱，各省也奉命设置机构铸造大钱。咸丰年间，地方钱局已多达33处。咸丰三年（1853年）之前，地方钱局除个别外，一般仅铸小平钱。咸丰三年（1853年）之后，中央和地方所铸钱币不再只是小平钱一种，当四至当千就有15个等级。除小平钱继续称通宝外，当四至当五十，一般称为“重宝”，当百至当千则称为“元宝”；当十大钱亦被称为咸丰重宝。

总之，咸丰大钱种类繁多，各地所铸的铜币有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八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等超值大钱。另外，材质多样，大钱币材主要有铜、铁、铅；铜材又分紫铜、红铜、青铜、黄铜、白铜等。大钱的文字也多样，有汉文、满文、维文，或兼满、汉文，或兼满、维文。这些特征导致大钱流通时极其复杂混乱，影响了货币在市场上的形象和信用。

大钱最初铸行时，清政府认为其对于缓解财政危机确实有所裨益。但不久，随着铸造大钱的地区扩大、面值越铸越大，而单位面值的含铜量却一再减低，折当太重、分量悬殊、私自滥造等情况就出现了，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成色低下的铜铁大钱投入使用后，流通领域中同时存在银两、制钱和铜铁大钱；市场交易活动中随之出现了金属含量较低的通货将金属含量较高的通货逐出流通领域的现象，即劣币驱逐良币。

当五百、当千等大钱一出，私铸者随之蜂起。由于铜（主要是滇铜）的供给有限，当时政府铸造大钱的数目反而没有私铸数目多。私铸超过官铸，也是导致大钱跌价的原因之一。咸丰四年（1854年）7月，当千和当五百大钱，每千文面值实际只值四五百文，到10月间已经没有行市。大钱贬值，物价自然要受影响。咸丰四年（1854年），北京一带，乡下小麦每斤只要制钱十六七文，城中却要三十七八文，一城之隔，相差一倍。大钱和纸币主要是在北京城内流通，农民不愿把粮食运进城去贩卖，北京出现农业丰收却城内缺粮的情况。

一方面铸币贬值，另一方面滥发纸币，清政府搜刮到了大量的铸钱利润，却造成了此后的币制混乱和通货膨胀。大钱政策很快宣告失败，给国民经济造成长久的不良影响。

咸丰四年（1854年）7月19日，清政府决定停铸当五百、当千大钱，或令换钞，或于捐输等项中收回，逐步销毁，重铸当十、当五十大钱，并要求严格保证当百以下大钱的铸造质量。但是，形势并未好转，民间对大钱的抵制愈演愈烈。咸丰五年（1855年），清政府停铸当百、当五十大钱，只铸当十钱。咸丰七年至九年（1857~1859），当十钱已跌落到最低限度，铸造大钱不再有利，清政府只好停铸，咸丰大钱政策宣告失败。□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